

2807

2000年8月
(第102期)

华亭文史

第一期

总字(102)号



政协华亭县委员会学习文史群体委员会编印 2000年5月20日

政协甘肃省委员会主席杨振杰 一行检查指导华亭县政协工作 程 有 贵

1999年3月27日，由省政协主席杨振杰、副主席喇敏智、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薛金山等领导组成的省委、省政府抗旱春播检查组，来华亭检查指导抗旱春播工作。

杨主席一行6人，在平凉地区行署专员马永孝、政协平凉地区工委主任李文业、县委书记吴定军、副书记王明孝、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宝明、政府常务副县长陈爱明、副县长王长庆等陪同下，在检查指导春播工作之余，特意到政协机关来看望全体工作人员和农口政协委员，并进行了亲切座谈。

座谈会上，县政协主席程振中汇报了一年来政协工作情况及新的一年和今后政协工作打算。

省政协主席杨振杰听了汇报，高度赞扬了华亭县政协换届开局一年来所作的各项工作，对今后工作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说：近年来，华亭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一方面是县委、政府正确带领全县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政协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做的贡献，政协在围绕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感到华亭县政协在履行职能当中做的是很好的。政协领导积极参与县上中心工作，并作为自己的大事来对待，共同担当全县各项工作任务，积极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围绕“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所提意见、建议关系全县的大局；通过各种途径，认真搞好提案工作，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重视，这些工作，除了政协自身的努力外，得到了县委的高度重视和人大、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是做好政协工作的基础。今后，希望政协加强同县上领导的沟通，多汇报，取得县委的重视；主动一些，争取政府的支持。也希望县委进一步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继续给予重视，县政府对政协开展的工作给予更多的支持，为政协创造一个有利的工作环境。最后，杨主席希望通过县政协组织转达他对会体委员的问候。

这次杨主席检查指导县政协工作，使政协全体工作人员和到会政协委员深受鼓舞，表示一定要将领导的关怀和爱护变为动力，认真搞好各项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会后，杨主席等领导与政协机关人员和农口委员合影留念。

杨主席一行于3月28日离开华亭赴崇信。

1999年3月31日

华亭文史

第二期

总字(103)号

政协华亭县委员会学习文史群体委员会编 2000年5月20日

反腐败斗争的初战——“三反”、“五反”

——华亭“三反”“五反”运动概况

郭进学

“三反”和“五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情况下，为保持中国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所进行的反腐败这一长期斗争的初战，并且取得了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按照《共同纲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但是，资本家当中的一些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的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用向国家干部行贿等手段获取高额利润。这种情况的严重发展，使党中央不能不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主要是反对贪污）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的“五反”运动。

1952年1月11日，中共华亭县委根据中央指示，分别召开了县委和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安排开展“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并成立了以吕建周（县委书记）为主任委员，郭文玉（公安局长）、何俊清（贸易公司经理）为副主任委员，黄延信（组织部长）等十二名委员组成的县节约检查委员会。各区除二区（安口区）成立分会外，其它各区成立小组。12日，召开全县干部动员大会，宣布“三反”运动开始，会议号召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要向土改、镇反、抗美援朝那样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进行“三反”运动，使每个群众都要了解政策，积极加入到这一行动中来。运动分三个阶段，在党政机关进行，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领会、掌握文件精神，提高觉悟，端正态度，要求各单位各部门领导亲自动手，及时检查，随时指导，把学习文件与本单位存在的问题和个人思想作风结合起来，彻底坦白自己，积极检举别人。在学习过程中，县委领导先后五次召开干部动员大会；在城关区工商界群众中召开两次动员大会，经反复动员和学习，大部分干部群众有了明确的认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第二阶段，中心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打通思想顾虑，进行自我检讨，向党和人民政府彻底坦白，交代贪污事实，查找浪费原因。在运动转入第二阶段的揭摆问题中，仍有部分干部存在一定的思想顾虑和模糊认识：有的认为，“三反”运动有时间性，时间一过就无事了；采取拖的办法，或者就是说小不说大，避重就轻；有的认为自己的贪污在

众里面，未在机关，谁也不知道，就是工人、商人、农民知道；有的认为自己是供给制或薪金制，没有什么约可节约，也没有什么贪污浪费；有的怕说了自己的贪污要丢人，受处分；有的怕说了本单位的问题和领导的毛病，组织上不信任，不给工作，打击报复等，所以既不检举别人，也不坦白自己。针对上述情况，县委及时采取“调查研究，清查帐项，领导先脱裤子和个别谈话、启发说服”等措施，充分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指出这种思想和看法是错误的，不够觉悟的，如果这些同志不积极参加到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来，在实践中锻炼和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在另一种情况下，就可能走贪污腐化的路子，革命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就不能巩固地建立起来，所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群众的任务，也是改造自己的伟大斗争，任何自由主义的态度都是有害的，必须加以制止和纠正。并结合实际制定了基本原则与政策。1、对积极勇敢彻底坦白自己的干部，并有决心悔过自新表现者，重罪轻处，次罪减处，轻罪免处。2、对不自动彻底坦白的人，企图钻空子，拖延时间，准备隐瞒过去，或者有避重就轻打算，都是抗拒运动的行为，经调查、检举、搞出来应按罪恶大小分别严加处理。3、对于工商群众和干部有行贿等偷税漏税的不法行为，如是工商群众主动彻底坦白自己，检举别人，应当严加处理工商人。4、对尚未传染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同志，在此运动中能积极帮助别人，大胆揭发，应当表扬。对积极负责、启发帮助别人坦白或检查、检举认真

有功的干部或群众应当表扬或奖励。第三阶段是处理问题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和总结工作。工作中心要以税务局（包括税务所）、粮食局、银行、贸易公司，县财政科、公安局等单位，以在机关的干部为重点，参加土改的干部若联系到个别同志可调回机关处理。“三反”历时半年，有38个单位、248名干部参加，检举、揭发贪污案件233件，浪费案件117件，官僚作风案107件，揭发、清理出有问题的人169人，以直接贪污、集体贪污、变相贪污及挪用公款等手段，贪污、挪用公款1亿多元（旧币），银币402元，小麦5246公斤，及电话器材、眼镜、布料等，对犯有贪污问题的干部职工分别进行了党纪、政纪处分；对犯有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当众检讨，批评教育。

1952年1月，中央指示，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斗争。4月，中共华亭县委根据省委、地委指示精神，在全县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五反”运动。动员干部群众团结正当工商业者，揭露工商业者中的不法分子，打击其违法行为。“三反”和“五反”运动，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决定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在运动追查贪污犯的“打老虎”阶段，发生过一些过大的偏差，根据中央指示，随即作了纠正。这次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作用。“五反”运动，打击了

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使我们党在对资产阶级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取得的又一个回合的胜利。运动过后，针对新出现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的情况，县委根据中央指示，及时采取调整措施，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和大量的收购农副产品，以提高农村购买力，调整税收负担，教育私营工商业者和工人努力完成生产任务，保证他们的合理利润，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以1952年同1949年相比，我县工商业户数由370户增至912户，增长41.7%，从业人员由623人，增至1673人，增长37.3%，占有资金总额达到322680万元(旧人民币)。私营工商业者的发展，为满足人民的需要，帮助商品流通，促进城乡交流，吸纳职工就业，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增加国家税收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也为巩固新生政权和即将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来说，“三反”、“五反”运动是我们党进行反腐败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是反腐败斗争的一次成功范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陈毅元帅在一首诗中写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可说是一语中的，愿世人能以史为鉴，把握自己，驾驭人生；做有益社会的人，不做金钱的奴隶，不为金钱所羁绊。

根据党史资料整理

2000年4月24日

华亭文史

第三期

总字第(104)号

政协华亭县委员会学习文史群众委员会编 2000年5月22日

李宝箴父子生平事略

禹殿华

李宝箴(1918-1960)字鉴享,号关山红梅李王,斋号关山内河墨轩、红梅馆,回族,祖籍四川广元,清末因逃荒避难,辗转迁徙到华亭县安良镇散庄子落户(后划归宁夏泾源县今称新民乡先进村)。

其父李占春(1873-1947)字南浦,出身小商佃农,虽无文化素养,但为人豪爽,仗义磊落,交游广泛,关心穷苦,对土豪劣绅的胡作匪为,疾恶如仇;练得一身好功夫,兵器中的刀、锤、棍、剑俱皆精通,又善驯劣马,处事粗中有细,颇有韬略。因此,周边地区三教九流俱佩其为人,说起“李老五”人人皆知,谁有被官方或江湖刁难之处,寻到他跟前,有他一张纸条就可解决困难。民国十年以来,兵燹匪祸扰民不休,华亭地处陕、甘关陇要隘,散兵、游勇、叛军、土匪

随时出没，攻城掠村，抢劫杀人，荼毒百姓，害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为了维持地方稳定，保护人民安全，汉回士绅、各界人士建议地方政府，征聘李父参与组建地方武装——民团，当局委任他为陇东兵站站长，负责应付过境军队的粮秣，从此他们迁入县城北关佃租地方，经营商业。李父在参与民团领导成员时，为保卫地方安宁多次出面对那些窜境土匪和变兵头目如李水娃、张老九（张应坤）、石志法、杨老二（子福）、马鸣鹿等分别采用剿抚并施、恩威并重的办法，使其迅速离境。为减轻人民负担，在支付过境军队粮草时正义抗争，不畏强暴，甚至有时还被吊绑拷打，百般折磨，但他从不多付，使其奈何不得。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抓兵拉伕，以马代丁，敝病百出，穷苦人民在以马代丁购马过程中多受政府胥吏、保、镇乡丁和军方共同勾结敲诈勒索之苦。有时倾家当产还不能避免当兵的苦楚，遇此情况有人求他相帮时，他都慨然应允出面斡旋，说服劝解。当地方士绅和官府之间的派系矛盾炽热化时，他从不以个人感情和好恶影响出发偏袒任何一方，而是以大局为重，公正排解，使得大家心服口服，深受各个阶层的爱护和拥戴。从民国中期以来他先后又被推举为华亭县回民教育促进会理事长、县商会会长、县参议员。因他为人作商讲究信义，因而生意越做越大，先有二间门面的坐商商号——春盛生，后来又有行商骡队，往来陕甘两地驮运批发出售当地土产——大麻、药材，进购陕西布匹、茶叶等，并扩大经营坐商铺面，改春盛生为宝春和，兼营药铺生意，当此期间，中共地下党组织也通过

关系，谎报其借骡队往返陕甘便利条件，为被国民政府封锁内镇原、庆阳红区属地孟坝运送棉布、药品、文印纸张等诸多货物，自家则带上红区的土特产青盐等，间接为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区辖地在生活用品上给了一定的支援，而且他明明知道县城东关自己的近邻张建业家，时常出没的李花匠（中共华亭地下党负责人——李义祥）是一个共产党员，国民党特务组织和便衣队负责人多次到他处询问了解，企图予以加害，但他却佯装不晓，故为辩白。又如他对门的冯国祥家有一门客（人称慕科员，镇原人），公开身份是旧政府职员，后为特务便衣盯住不故，也被他设法帮助李躲过危险。龙门洞景峰山有几个被陇县民团抓去的共产党嫌疑人员，正当被解送上缴时，有人请他帮忙，他毫不犹豫派人给陇县民团送去名片一张、便信一封，声明是他的江湖朋友央其释放，陇县则立即放人，其实这几个人正是共产党所属游击队的失散人员，后来陇县地下党组织还通过陇县峡口周家渠一陈姓红帮成员口头致谢问好。

但是那些心怀叵测，存心不良的贪官污吏、势利小人却对他恨之入骨，伺机陷害。民国卅五年（1946），他被诬告到平凉专署，当时号称郭阎王的平凉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处处长郭培师，派来数十名宪兵警察抄封了李的家院，将李父五花大绑拉往平凉监狱，企图以“莫须有”罪名致其于死地。当他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受他恩惠的父老乡亲不分回、汉、贫富，携老带幼前往探视，络绎不绝，馈赠物品种类繁多，使同监犯人和看守兵丁大为感动，华亭六个乡镇的百姓乃至

周边百姓以请愿、具保、登报等多种形式上访省府，为李父申冤，迫于人民群众的呼声，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亲自出面责令郭培师释放李占春，为其恢复声誉，并传其到兰予以接见，交谈之后为其书写缝置“嘉惠桑梓”锦缎软匾一个。李父虽无文化，但深刻认识到提高民族教育素质的重要性，他协同华亭东关回汉民族上层人士先后响应重视教育的县长王玉堂和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的号召，倡办创建了东关初小和边疆小学，并说服城区各清真寺支持协助回民贫困优秀学生到中等以上学校深造学习，并以身作则供李宝箴上初中、师范、美专等学习。

李宝箴生性憨厚忠诚却又天真浪漫，语多诙谐，心底善良，同情劳苦人民，特别是他有艺术天赋，从小热爱人物、山水、花卉、翎毛、博古之类的写生临摹，每见一幅好画、一树好花、一处好景，即凝神入视，留恋忘返，反复琢磨，或挥笔临仿，或以纸代笔，或打腹稿决不放过。1937年夏他从华亭初中转赴地处兰州七里河小西湖的“西北回民中学”师范班就读，1939年毕业后，到西吉县一个贫困山区从事民族地区的普及教育一年之后，经人介绍到西安进入从上海流亡来秦的国画大家李丁陇和郑墨君夫妇创办的“仇儒美术艺专”师从丁陇夫妇研习国画，由于他专心致学，在书画习作上有独到之处，深受李丁陇先生夫妇二人的青睐，对他倾心指导，学有所成返回华亭，暂在东关边疆小学任教，工作之余对国画创作毫不懈怠。时隔不久，李丁陇因反对内战，宣扬民主，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列为打击陷害主要对象，为保自身安全，

致信李宝箴要求照应来华避难。李父闻讯，迅急派家丁赶上骡子千里迢迢，接李夫妇到华亭，李父为其安排食居百般体贴，并利用自己在华亭的声望，为他夫妇倡办两次画展与义卖，后李想去敦煌考察研究千佛洞文化，李父随即慨然允许，当即表示从人力、财力上给以大力支持，并对其即将分娩的妻子墨君多方关照。后来李丁陇西越关山沿丝绸古道达艺术宝窟所在地——敦煌，实地写生临摹，为其艺术生涯增添了辉煌的一页，李丁陇后来在全国画坛闻名遐迩，成就卓越，与李一家的无私帮助是分不开的。

李宝箴接任边疆小学第三任校长后，正逢日寇投降，物价暴跌，钞票贬值，国家困难之际，教师每月两担霉变小麦（折290市斤）动辄累欠，为维持教学，他只好从自己家里给以补贴，鼓励大家专心教学，此期间他在国画研习之外，又临研究钟鼎文、秦书、魏隶，对于小篆和魏隶造诣颇深，于是文人墨客，普通爱好书画的老百姓争相求书要画，特别是每到春节，使他应接不暇，有时彻夜不眠，妻子小妹皆为其磨墨净案，决不使造访求书的人失望。

他个性有点执著、古怪，对个别权贵官绅、势利小人一贯不视，甚至佯装呆痴、奚落笑骂、揶揄讽刺，例如一次国民党县政府某秘书前来求画行动傲慢，要他擅长的莲花，他却挥笔画了把镰刀，然后固装不解说：“唉，我听错了还以为你要个镰刀呢！”使得边位秘书悻悻而归。但对一般职工平民百姓却谦虚有礼，尽量满足，见到贫寒受难者或慕名求助者，不论远近，不分回汉尽力帮助，有时直接领到其商号

“春盛生”责令经理杨葆仁支钱取物或领去家中让管家装粮给面，为此经理、管家对他意见很大，常在他父母处发牢骚。有年冬天他见从十二堡远道面来的一位远亲，冻得打哆嗦，于心不忍，又无衣可给，就将身着名贵紫羔皮大氅毅然相送。多年来，他们是佃租别人房屋居住或经商，民国卅三年（1944）当其父大兴土木营建盼望已久的新大宅院时，他很以为然，表情冷漠，别人不解而问时，他说只有那么几口人，盖那么多房，倒不如修个学校，可见其胸怀大众心系教育的风格。

1947年5月其父病故，李因不谙于治家之道，对部分以求贷告借名义者不问虚实俱皆应允，随意周济，加上过去被他白眼相看的那些刀笔小吏、劣绅镇丁保甲长等相互纠结，狼狈为奸恣愿专、县两级税政部门，以征收“遗产税”名义，对其敲诈勒索，施加压力，使其原本有限的一些动产家什变卖一空，尝不能满足官府。这时经理、管家等以借口辞归，使他家立即门前冷落，入不敷出，生活窘迫，诚所谓“树倒猢猻散”。只有那所豪大宅院，无声迄立，连旧日供养的一些食客们也都是倒目而过，甚至还在一旁幸灾乐祸，说三道四。

1949年华亭解放，他家成份订为地主，李木人被订为“自由职业者”。但因母亲年迈，妻子多病，子女又多，没有劳力。光凭土改所留的一分土地难以发日。这时李不得以而到前、后山煤窑下苦担炭，在工队当泥瓦小工补贴生活不足。1951年经人民政府录用，先后任小学教师、文化馆员、剧团

画工。在每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他都勤恳工作，毫不懈怠，对事业、对同志都很忠诚。李初出社会当教师时因深受陶行知先生实验教育理论的启发，很注意培养学生实践知识，如给学生教画白菜、菜蕻时，他出钱称上牛肉、豆腐、大葱、调料，相互与白菜、菜蕻搭配烹调，使学生通过实际品尝一饱口福，认识蔬菜对人体营养供应的关键所在。五十年他在安口、华亭等教书时，热爱关心儿童，从不对学生体罚呵斥，对那些家庭贫寒，学习优秀者还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给赠买学习用品，天阴下雨护送学生回家或过河；他跟父亲学过拳击武术，旧时在边疆小学很注意对学生体育发展教育，给学生创教一套简易可行的强身武术操，曾多次在县级运动会获奖。在文化馆工作时他的国画作品曾获五六年省级国画奖，并被收藏；在县文工团工作时又悉心于秦腔脸谱研究，并和团长方作需共同对剧目修改、唱词编写与布景制作、化妆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和独特之处。

然而就这么一位诙谐、活泼、执著、浪漫的艺术家在他艺术创作的黄金时代，却逢厄运被打成右派，1958年元月又被迁送宁夏潮湖农场去劳教，1960年4月不幸去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华亭县委于1979年4月为其昭雪平反，并给子女安排了工作。

他的国画作品在陇东和西海固地区流传颇多，人民大众对其影响深刻，现今他的长子已从各个方面收集整理了他的遗作，诸如山水、花鸟、人物、隶书、灯苡等诸多字画条幅和《红梅馆主李宝箴画册》壹本，打算影印成册。